

DOI: 10.16482/j.sdwy37-1026.2022-05-002

# “语言”与“社会”的互融: 社会语言学的 核心课题与理论聚焦

田海龙

(山东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 社会语言学长久以来被认为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二者之间关系的学问,然而,这种预设出“语言”与“社会”彼此分离而独立存在的观点在21世纪的社会语言学和语言人类学研究中受到质疑。本文通过梳理社会语言学经典和前沿文献,发现社会语言学已经将“语言”与“社会”互融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而将二者融为一体的“胶粘剂”则是“语言意识形态”概念,以及后续发展出的一套新概念和新理论。文章详细阐述这一研究发现过程,认为“语言”与“社会”互融为一体并作为社会语言学核心课题,对认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焦点和进行社会语言学理论创新具有启示和意义。

[关键词] 语言; 社会; 语言意识形态; 社会语言学; 新焦点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2022)05-0009-12

## Integra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ety”: A New Focus of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and Theorization

TIAN Hailo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358, China)

**Abstract:** Sociolinguistics has long been conceptualized as a 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society, but this conceptualization has been challenged in the 21<sup>st</sup> sociolinguistics and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for having taken “language” and “society” as separated. In reviewing seminal and edge-cutting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takes on the proposition of sociolinguistics that “language” and “society” be integrated into a whole of linguistic action, the “glue” of which is “language ideology” and the set of recently developed concepts and theories. This new proposition of sociolinguistics is discussed in terms of its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so are the implications for the sociolinguistic

收稿日期: 2022-04-05; 修改稿: 2022-07-21; 本刊修订: 2022-08-19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人口流动与柯因内化语言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18BYY06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田海龙, 博士,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研究。电子邮箱: thailong@163.com。

引用信息: 田海龙. “语言”与“社会”的互融: 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与理论聚焦[J]. 山东外语教学, 2022(5): 9-20.

innovations to be brought about by this new focus of sociolinguistic research and theorization.

**Key words:** language; society; language ideology; sociolinguistics; new focus

## 1. 引言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系统研究语言与社会彼此相互联系与影响的语言学分支学科。它可以研究社会因素对语言变化、语言保护、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影响 形成“语言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language)”亦称“宏观社会语言学”;也可以研究社会结构如何影响语言的使用以及特定的语言结构如何与特定的社会因素建立联系 形成“社会的语言学(linguistics of society)”亦称“微观社会语言学”(Coulmas, 1997)。基于宏观和微观的视角 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已是非常宽泛;由于社会语言学具有“交叉学科”“经验学科”(祝畹瑾, 2013)的特征 其研究内容更显得无所不包 似乎与社会相关的任何语言使用问题都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之列。如王春辉(2019)所讲,“语言与性别、语言变异与演变、双语/双方言与多语、语言与认同、法律语言、语言社区理论、城市语言调查、语言濒危与保护、网络语言、话语分析、语言态度、新媒体语言、语言服务、语言景观、语言能力、语言资源、地名/人名、外来词、语码转换、农民工/流动人口/特定群体的语言、语言接触、会话互动、新词新语、语言政策与规划”等等,都被视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内容。如果在中国知网以“社会语言学”为篇名检索,呈现的两千多篇中文论文所含盖的内容种类之多,更是不胜枚举。

社会语言学研究课题的宽泛体现出社会语言学倡导的研究理念日益得到学界的认可。社会语言学区别于将语言视为封闭系统的索绪尔语言学,也区别于注重语言生物特征的乔姆斯基语言学,开创了将语言运用与其所处社会语境联系起来进行研究的路径,成为过去半个多世纪语言学领域的重要研究范式。社会语言学以探究社会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为目的,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研究路径,如在探究语言变项与社会变项的联系中形成变异社会语言学,在探究言语交际的过程中形成交际民族志和互动社会语言学(田海龙、赵芑, 2021)。这些研究路径关注的重点不一,产出的理论各异,但是,社会语言学发展到研究课题似乎“无所不包”的境地,也促使我们思考社会语言学研究课题的实质及其理论创新的焦点究竟是什么这类涉及社会语言学本质特征的问题。这种思考可以导致对社会语言学研究范畴的界定和对社会语言学理论边界的确定。但是,本文呈现的思考不以获取量的确定结果为目的,“核心课题(key issues)”在本文中包含“主题(topics, themes)”的含义,但主要指研究对象(objects)和由此而生的研究问题(issues);而“理论聚焦(focus of theorization)”则更多地指那些既区别于社会学又区别于核心语言学(core linguistics)的、关于社会语言学核心课题的理论观点。因此,本文致力于对社会语言学核心课题应具有实质特征进行探究,以阐释社会语言学将“语言”与“社会”融为一体研究的成果,在此基础上讨论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内涵,从质的方面获取关于社会语言学理论原则的基本认识。

## 2. 核心课题:演变与突显

### 2.1 相互独立的“语言”与“社会”

尽管社会语言学在其诞生初期有“宏观”“微观”之分,但是,社会语言学的发展已经显示出,社会语言学更多地关注“社会中的语言”这样“微观”的问题。“语言”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指社会生活中使用的各种语言变体,而“社会”则大可指称“文化”,小则指称“社区”,虚可指称“态度”,实可指称“年龄”。这些“社会”与语言变体的关系构成了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课题(徐大明等,1997;郭熙,2004;Wardhaugh & Fuller,2021:15),具体体现在语言演变、语言变异、语言社区、多语现象、语言相对论等问题上面(Coulmas,1997:6-8)。然而,在探究语言与社会关系的过程中,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一直沿着“社会决定语言”(如情景语境决定意义,见Manlinowski,1923)或“语言决定社会”(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抑或“语言与社会相互作用”(如认为语言与社会存在辩证关系)的方向前行,而“语言”与“社会”则在这个过程中长期被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因素。

例如,在语言变异和演变方面,尽管拉波夫纽约百货商场的经典案例研究确立了语言变体与社会层级之间的共变关系(Labov,1997),但是,这类属于变异社会语言学第一次浪潮的研究将语言变体的社会意义视作来自语言之外的社会宏观结构的作用(Eckert,2016:68),因此对语言变体与社会阶层之间共变关系的考察也是建立在将二者视作两个独立因素的基础之上。与此类似,不论是“语言相对论”的强式版本,即认为语言固有的不同结构和词汇可以决定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具有不同的思维方式,还是“语言相对论”的弱式版本,即认为语言只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人们的思维方式,二者都是在将语言与社会区分为两个不同因素的基础之上提出的。言语社区和多语现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存在类似的区分。就前者而言,不论是确定言语社区,还是考察实践社区,只要是考察语言使用者的社会群体属性,都需要从语言使用的特征入手,如依据共同使用的方言确定方言使用者属于某个言语社区,或依据在共同感兴趣的活动中使用的语言变体确定语言使用者属于哪个实践社区。就后者而言,即使是将多语现象作为社会现象来考察,也需要以多语社会中的语言接触和语言景观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讨论多语现象中所蕴含的语言态度等问题。

毋庸置疑,将语言与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因素,致力于探究二者之间的联系,社会语言学有许多课题可以研究,除了库尔马斯(Coulmas,1997)所列的课题之外,还可以加上许多,如语言与性别、语言风格、语言态度、语言与互动(Coupland & Jaworski,2009a),以及语言教育、语言政策与规划(Paulston & Tucker,2003)。这些课题在不同的教科书(Wardhaugh & Fuller,2021)、读本(Coupland & Jaworski,1997,2009a;Paulston & Tucker,2003)、通览(Coulmas,1997)中都有呈现。然而,这种罗列随新课题在社会发展中不断涌现会无限延续,任何时期的任何教科书都不可能将其完全囊括。因此,关于社会语言学核

心课题的讨论就需要转而关注更为实质的问题,如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具有什么实质性特征。

## 2.2 “语言”与“社会”的互融

实际上,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社会的认识已经从注重彼此之间的关系发展为注重二者融为一体,开始关注语言与社会二者“合二为一”的“互融”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已经有所深入,开始触及及其研究课题应具有的本质特征。这方面的认识始于海姆斯和甘柏兹关于言语互动的言语民族志和互动社会语言学研究。根据田海龙和赵芄(2021:90)的研究,“海姆斯的交际民族志传统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从一开始就坚持将语言与社会在概念上合为一体,认为二者之间没有清晰的边界,语言运用的某种特定形式和功能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性组织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构成社会文化本身的某些特征。”因此,海姆斯将研究的重心落在“言语事件”上面,认为这种“具有文化特征、基于语言运用的交际活动”(Coupland & Jaworski 2009b: 576)既体现语言范畴又体现社会范畴,是“语言”和“社会”的综合体。在此基础上,甘柏兹的互动社会语言学将言语事件中的“交际”概念发展为“互动”,将社会语言学从社会的角度研究语言和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社会这两条研究路径交汇在“社会互动”上面。在这个意义上,言语民族志分析“言语事件”的“SPEAKING”模型(Hymes 2009)和互动社会语言学分析“言语交际活动”的“情景化提示”(Gumperz 2009)是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运用”的研究和关于“社会范畴”的研究两个研究路径汇合在一起的结果。正如卡博兰德和吉沃斯基(Coupland & Jaworski 2009b)指出的那样,社会语言学在对语言运用的研究中逐渐认识到,如果要阐释人际交际得以顺利进行的机制则必须认识语言运用的社会意义,因此需要赋予语言运用以“社会活动”的性质;同时,社会语言学在对社会范畴的研究中也认识到,如果要阐释社会身份在语言运用中如何产生,同样需要关注“社会活动”。

沿着海姆斯和甘柏兹的路径,语言与社会“互融”的进程进一步深入,以至语言与社会“合二为一”,共同成为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个“综合体(complexity)”。促进这一进程的是语言人类学关于语言意识形态研究的成果。

“语言意识形态”指语言使用者和研究者对语言的主观认识,是“对语言本质、结构、以及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使用作出的具有道德和政治意义的表述”(Irvine, 1989)。“语言意识形态”概念的提出与美国符号学家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有理论渊源。不同于索绪尔“能指-所指”的二元符号学思想,皮尔斯的符号学思想是三元的,除了“符号”和“对象”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解释项”。在皮尔斯看来,符号之所以成为符号,以及符号与物体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可以成为指向关系、象似关系、象征关系,都是解释项居间“猜想(conjecture)”、“溯因推理(abduction)”和“识解(construal)”的结果(Parmentier, 1994: 2)。皮尔斯关于“解释项”的论述促使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1979)用“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调节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辩证关系,而“语言意识形态”作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一种“调节力量(mediating force)”(Woolard 2021: 2),最终将语言与社会粘结在一起。

西尔弗斯坦基于皮尔斯符号与物体的“指向关系”提出“指向性”的概念,认为一个语言特征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那个现实社会中的情景,如特定的发音方式可以指向它经常出现的特定地区或阶层,以及那个地区或阶层中经常使用它的说者。西尔弗斯坦把语言特征的这种指向意义称为“第一级指向意义(first-order indexical)”,并认为这种指向意义具有“预设”的作用。例如,在美国匹茨堡地区双元音/aw/经常被发成单元音/o/,这种发音特征就被语言研究者指向了已经存在的匹茨堡西南部地区和劳工阶层,以及如此发音的这一地区和阶层的(男性)说者。换言之,这种发音特征可以“预设”出发音者的身份特征(Johnstone & Kiesling 2008: 10),因此具有指向意义。然而,这种特定的语言特征也会被赋予社会意义,如这种发音对某个特定群体来说比其他群体更适合或更应该,或者可以给该群体带来更多的尊重。该发音特征的这种社会意义被称为“第二级指向意义(second-order indexical)”。这种社会意义之所以能够产生,在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2003: 212)看来,是因为言说者(或研究者)受“民族元语用驱动(ethno-metapragmatically driven)”对这一语言特征进行“本地解读(native interpretation)”的结果。换言之,是言说者(或研究者)依据已存在于自己认知中的文化语境图式(stereotype)对这个具体的语言使用情景实施主观识解的结果。就匹茨堡地区双元音单元音化的案例而言,由于头脑中已存在的文化语境图式,如拥有这种双音发单音的发音方式的人多是劳动阶层的男性,那么,如果一个人想让别人听起来他像是受过教育的人,就要尽量避免双元音/aw/发成单元音/o/;反之,如果想让人听着更像劳工阶层,就要努力在言谈中使用这种单元音化的发音方式(Johnstone et al. 2006: 83)。可见,在该发音特征的第一级指向意义“预设”语境的基础上,第二级指向意义则“蕴含(entailing)”出社会意义,使人们认识到这种发音特征适合哪种情景,和哪种社会身份匹配。在这个语言变体创新使用的过程中,语言意识形态发挥了重要作用,它将语言变体与言说者的身份已融为一体,进一步体现为西尔弗斯坦所说的“第三级指向意义(third-order indexical)”:当人们不仅注意到将/aw/发成/o/这个语言变体指向匹茨堡西南部和劳工阶层(“第一级指向意义”),而且注意到这个具有地方特征的语言变体已经形成了一种言谈风格(“第二级指向意义”),并将这个风格变异与他们作为匹茨堡人经常听到的方言变体联系在一起,这时,如果他们有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图示,即每个地方都有方言,听到一种方言就可以知道说这种方言的人来自那个地方,那么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言谈中使用这种语言变体(如将/aw/发成/o/),以显示自己来自那个地方,或者创造一种幽默,抑或创造一种轻松的氛围。这种被实施的(performed)言谈氛围即是第三级指向意义,将使用该发音的意愿与听起来具有地方性的言谈联系起来,进而将发音与身份合为一体。

### 2.3 “语言”与“社会”的全方位融合

社会语言学始于对语言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这方面的各种认识经过不断的演变和发展,最终聚焦在语言与社会“合为一体”的认识上面。这种核心课题的聚焦点体现在贝尔(Bell, 2014: 6-12)识别出的社会语言学全部三个分支领域:变异社会语言学、民族

志-互动社会语言学、多语现象社会语言学。就变异社会语言学而言,经过第一次浪潮对语言与社会共变关系的研究和第二次浪潮对言说者能动性的关注,第三次浪潮对风格实践的研究更加凸显了语言变异对言说者身份的建构作用(田海龙,2022),因而也明显地体现出语言与社会的“综合体”特征,即言说者的身份(identity)、风格(style)和立场(stance)都镶嵌在具体使用的语言之中,与语言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民族志-互动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而言,前面讨论的“言语事件”已经集语言与社会为一体,然而,民族志-互动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社会“互融”认识的深刻程度远非如此。甘柏兹和海姆斯在认为会话含义是在言语互动过程中由会话双方互动协商生成的同时,还认为社会因素与言语形式的关系不是一种共变关系,言语交际也不是仅仅反映其他社会因素。对此,兰普顿(Rampton,2016:308)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互动社会语言学关于言语交际的研究并不是说明言语交际仅是反映与言语交际相关的其他因素(如社会规范),而是表明这些社会因素本身就存在于交际行为之中。兰普顿(Rampton,2016:308)甚至认为甘柏兹的观点——关于行为规范不应该是其他独立存在的社会规范的反应——与福柯的话语建构论如出一辙。在多语现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方面,虽然社会生活中语言运用的宏观问题在语言政策研究中仍然受到关注,但是,语言使用者如何在多种语言中做出选择并利用语言资源实现自身目的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语言被视作社会实践的研究日益凸显。在这方面,布鲁玛特(Blommaert,2010)通过对互联网上“出售美国口音课程”案例的研究,表明语言可以成为商品并在国家层级的语言市场上具有商业价值。边缘地区的人通过购买和学习如何讲美国口音的课程,其目的是实现身份的提升并获取更大的经济收益。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与社会形成互融;正如贝尔(Bell,2014:9)所指出的,语言不仅为社会所建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建构着社会。

### 3. 理论聚焦: 发展与创新

社会语言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研究课题非常广泛,但是,其核心课题仍然是围绕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而且,各种认识在不断探索中相互交流,甚至碰撞,最终将语言与社会两个相对独立的范畴合为一体,构成社会语言学新的核心课题。这一过程不仅将社会语言学内部的不同领域统一在共同的兴趣之上,如将贝尔(Bell,2014)认为的社会语言学三个主要分支及其次要分支(如语言政策与规划、应用语言学、语言接触、语码转换、方言学、历史语言学、语言与性别、语用学、语言人类学、会话分析、话语分析、语言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统一起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社会语言学理论的基本内涵。这对我们认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原则非常重要。社会语言学的理论之所以区别于语言学和社会学的理论,关键在于它在研究社会生活中的语言运用方面打破了宏观/微观的二元对立,解释了语言与社会互融的机制,并且形成了关于社会语言学理论焦点的共同认识。

### 3.1 二元对立的消解

宏观/微观二元对立思想的消解对社会学解决类似的问题提供了帮助。在社会生活中,可观察的许多(微观)活动都与其背后不为人知却起到控制作用的(宏观)社会规约相关。就具体的案例研究而言,不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在微观层面,抑或是在二者之间的联系方面,都需要有具体可观察的对象。然而这在社会学的研究中也非易事。在这方面,海勒(Heller, 2001: 212-213)认为社会语言学完全适合解决这类问题。她认为,“宏观-微观”的联系体现为社会时空中社会互动之间的联系,而社会语言学不仅可以分析沿时间轴展开的互动,还可以分析不同时间段的不同互动之间的联系。这些互动即是集语言与社会为一体的“交际事件”,或曰体现为社会活动的语言(language as social action)。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不仅仅是社会过程的反映,而是社会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成分;海勒(Heller, 2001)认为,语言与社会二者融为一体,成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这是社会语言学对社会学的一个理论贡献。她通过一个学校语言实践的案例研究,在“消解宏观/微观二元对立”思想方面做出了具有社会语言学特征且区别于社会学的理论贡献。

在社会语言学领域,“二元对立”思想不仅体现在“宏观/微观”层面,还体现在“结构/能动”“规约/实践”等成对的概念上面。在语言与社会被视作彼此独立的因素时,二元对立思想盛行,即使二者被认为具有辩证关系,如宏观层面的结构和规约被认为对微观层面上的能动和实践具有统治和规范的作用,而微观层面的因素也能反映宏观层面的因素,这种概念上的“对立”也无法体现出社会语言学将语言与社会“合为一体”的新思想。随着语言与社会被作为一个综合体成为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课题,这些二元对立的思想也逐步被消解,并被“标量路径(scalar approach)”所取代(Spitzmüller et al., 2021: 7)。“语言”与“社会”不再被认为处于二元对立的地位,而是被看作是处于一个连续体上的两个标量,在如直尺刻度显示的量的变化范围内动态变化,在彼此相关且相互构建的过程中,二者之间的边界也不是确定的,而是通过对它们相互作用的过程进行阐释才能呈现出来。

### 3.2 “语言”与“社会”的“胶粘剂”

在语言与社会彼此独立存在于社会语言学的研究中时,语言人类学者(如 Silverstein, 1979)提出“语言意识形态”的概念试图将二者联系起来。因此,语言意识形态也被沃勒德和舍夫林(Woolard & Schieffelin, 1994: 72)认为是一座“非常需要”的连接语言运用与社会结构的桥梁。随着“宏观/微观”二元对立的消解,有学者(如 Spitzmüller et al., 2021)认为这座桥梁已经锈蚀,并需要“修复”。与此相似却也不同,我们在认为“语言意识形态”是语言研究可以借助的一个分析工具(赵芃、田海龙, 2022)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其看作是粘结语言运用与社会文化结构的胶粘剂。可以说,正是“语言意识形态”发挥的“调节作用”才使得语言与社会互融在一起。

如 2.3 讨论的那样,一个语言变体之所以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完全是在“民族元语用驱动”下进行“地方解读”的结果。这个“元语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在社会文化层面具有权威和规范的文化语境图式,一种“模式化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具体语境中使用的某

个语言表达形式(或言说方式)被赋予具有比其他表达形式更合适的地位,使其产生某种社会意义。与匹兹堡劳工阶层男性双音单音化的例子(Johnstone et al., 2006: 83)相似,医生通过“望闻问切”诊断疾病就被认为比靠“化验检查”诊断疾病更适合于中医医院,这种中医语体(治病的行为方式)和话语(描述病症的术语)之所以具有这种“社会意义”就是因为在社会文化层面上人们普遍认可的“中医医院用中医治病”的这种“模式化观念”发挥作用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中医医院语言运用的“语言意识形态”便将“社会结构”内化到“语言形式”之中,促进了语言与社会的互融。同时,在这个调节过程中,社会文化层面的权威和规约也需要通过具有地方性特征的个体依据这些地方性特征对其进行解读,社会意义才可以产生。例如,虽然在中医医院使用中医语体和话语更为合适,但是,这种“一般”的“社会意义”如果被融入“具体”的语言运用之中,成为具体的社会实践,成为中医医生具体的治病行为,还需要医生个体对这个一般的社会意义进行具体的、因人而异的“地方解读”(田海龙 2020)。可见,“语言与社会”这对二元对立的因素在“语言意识形态”的调解下,在“民族元语用驱动的地方解读”作用下,被具有个体特征的主观认识融为一体,形成具体的语言实践。

“语言意识形态”作为“胶粘剂”将语言与社会粘结为一体,体现出社会语言学理论发展的一个方面。卡博兰德(Coupland, 2016a)曾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发展总结为五个主题,即市场(market)、移动(mobility)、模态(modality)、媒体(media)和元交际(metacommunication)。“市场”指社会语言实践的市场化或资本化问题,“移动”指全球化带来的语言流动和语言的(超)多样性问题,“模态”指意义生成的多模态性,表明除了语言还有其他各种符号可以生成意义,“媒体”指语言运用的媒介性,以及交际的媒体化问题,“元交际”则与“反思性(reflexivity)”相关,促使社会语言学理论从一般和具体两个方向观察语言变化。就这五个主题而言,“元交际”可以说是上文讨论“语言意识形态”的替代术语。在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 1979)提出“语言意识形态”概念之后,后续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多有贡献,提出了许多新的概念,如“指向场域(indexical field)”(Eckert, 2008)、“呈符化(rhematization)”(Gal & Irvine, 2019)、“交际界位(stance)”(Jaffe, 2009)、“语域化(enregisterment)”(Agha, 2007),都在不同侧面阐释了语言与社会合为一体的过程。卡博兰德提出“元交际”的概念,也是强调任何语言实践都融入了社会因素,同时,语言实践中具体运用的语言又体现着社会意义(Coupland, 2016a: 448),在一定程度上突显了“语言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研究是社会语言学区别于社会学的一个理论贡献。

### 3.3 边界的消解与认识的清晰

社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最终导致二者之间边界的消解,不仅使之融为一体,而且它带来的蝴蝶效应也使其他一些二元对立概念的区别得以消解。以往被认为彼此界限清晰和确定的范畴,其边界现在也变得模糊不清。例如,“语言政策与规划”被认为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语言变异”被认为属于微观社会语言学,这种传统的区分已经遭到质疑。布鲁玛特(Blommaert, 2010)在对南非开普敦一所中学读写课程的研究中



发现,个体语言差异对学生身份的建构作用不仅是语言变异研究的课题,而且也是语言政策与规划需要研究的课题(田海龙,2021)。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融问题,不仅体现出语言与社会合二为一,而且体现出社会语言学在理论上的发展。正如贝尔(Bell, 2014: 326)指出的那样,质疑语言与社会可以区分和独立存在,并且将二者作为整体进行分析和理论阐释,这无疑是社会语言学对社会科学的独特贡献。

实际上,消解“语言”与“社会”的边界,将二者融为一体进行研究,体现出社会语言学认识其研究课题的清晰程度,也体现出社会语言学关于社会生活中语言运用的实质性理论主张。这些研究课题和理论主张首先体现在对语言实践“社会意义”的理论探讨上面。“语言”与“社会”边界的消解导致社会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实践”,探究其包括语言风格、社会身份、交际界位等在内的“社会意义”。例如,言说者如何通过语言资源构建其语言风格和社会身份,成为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新关注(田海龙,2022)。在这方面,西尔弗斯坦(Silverstein)、艾克特(Eckert)、戈尔(Gal)、厄文(Irvine)、吉菲(Jaffe)等学者做出了很大的理论贡献。他/她们提出的一些理论主张,如语言变体(包括符号变体)体现和建构不确定的、因人而异的社会意义,已经成为变异社会语言学的核心思想(Coupland, 2016b: 15)。

其次,“语言”与“社会”边界的消解,及其所带动的“宏观社会语言学”与“微观社会语言学”之间界限的模糊,突显了21世纪社会语言学在语言流动、多语现象、语言市场等传统课题上提出的新的理论主张。如卡博兰德(Coupland, 2016b: 16)所指出的,由于“宏观/微观”概念在社会语言学的理论建构中逐步被淡化,因此关于多语现象的社会语言学研究也在重新考虑“语言”(特别是某些族裔语言)在多语社会中的地位和意义。它们的地位及具有的价值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和一成不变的,相反,被认为是从特定话语立场(如地方利益)解读的对象(Coupland, 2016b: 16),而这种解读也受到与当下全球化的自由主义经济相关的资本价值变化的影响。可见,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领域,社会语言学核心课题不仅体现为宏观/微观界限的消解,还可以强调对特定语言价值的评判具有动态变化的特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语言”与“社会”边界的消解带来的对社会语言学理论焦点的认识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包括前文讨论的层级理论、元交际和语言意识形态,以及本文没有篇幅展开讨论的批评理论对社会语言学理论建构的贡献。社会语言学理论焦点体现出后现代主义语言观的特征,强调在社会语言学研究关注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关注语言使用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这些对于聚焦社会语言学的最新理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4. 结语与启示

社会语言学对社会生活中语言运用的研究从对语言与社会关系的探究开始,发展到语言与社会的互融阶段,并将二者的综合体“语言实践”视为研究的核心课题。在这个认

识的发展过程中,社会语言学也从注重对语言运用现象的经验性描述发展为注重对语言现象的理论阐释。就本文讨论的内容而言,语言意识形态概念就在理论层面阐释了语言与社会融为一体的机制。这也代表了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发展方向。21 世纪的社会语言学更应该是注重理论创新的社会语言学(田海龙、赵芑,2021),这对中国的社会语言学发展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从吴春相、王连盛(2021)对国内社会语言学近十年的研究综述来看,社会流行语和热词、社会语言生活以及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研究构成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热点,但是他们基于期刊论文、出版著作和科研立项的数据统计并没有显示出我国社会语言学对社会语言学核心课题的理论发展。我国的社会语言学与英美的社会语言学有不同的研究传统,这是由于不同的国情和研究需求所决定的。然而,从学科的角度看,社会语言学研究课题的宽泛并不能排除其核心课题的存在,注重理论多元也不能忽视社会语言学的理论焦点。21 世纪的社会语言学已经开启了从“描述”进入“阐释”的发展阶段,有理由相信这种理论“阐释”将更加聚焦社会语言学的核心课题。

#### 参考文献

- [1] Agha, A. *Language and Social Relation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2] Bell, A. *The Guidebook to Sociolinguistics* [M]. Chichester: Wiley Blackwell, 2014.
- [3] Blommaert, J.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Globaliz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4] Coulmas, F. (ed.). *Th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 [C]. Oxford: Blackwell, 1997.
- [5] Coupland, N. Five Ms for sociolinguistic change [A]. In N.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a. 433-454.
- [6] Coupland, N. Introduction: Sociolinguistic theory and the practice of sociolinguistics [A]. In N.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b. 1-34.
- [7] Coupland, N. & A. Jaworski (eds.). *Sociolinguistics: A Reader and Coursebook* [C]. New York: Macmillan, 1997.
- [8] Coupland, N. & A. Jaworski (eds.). *The New Sociolinguistics Reader* [C]. Hampshire: Macmillan, 2009a.
- [9] Coupland, N. & A. Jaworski.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Part VI [A]. In N. Coupland & A. Jaworski(eds.). *The New Sociolinguistics Reader* [C]. Hampshire: Macmillan, 2009b. 575-581.
- [10] Eckert, P. Variation and the indexical field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8, 12(4): 453-476.
- [11] Eckert, P. Variation, meaning and social change [A]. In N.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68-85.
- [12] Gal, S. & J. Irvine. *Signs of Difference: 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Social Lif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13] Gumperz, J. Contextualization conventions [A]. In N. Coupland & A. Jaworski (eds.). *The New Sociolinguistics Reader* [C]. Hampshire: Macmillan, 2009. 598-606.
- [14] Heller, M. Undoing the micro/macro dichotomy: Ideology and categorization in a linguistic minority school [A]. In N. Coupland, S. Sarangi & C. Candlin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Social Theory* [C]. London: Routledge, 2001. 212-234.

- [15] Hymes, D. Models of the interaction of language and social life [A]. In N. Coupland & A. Jaworski (eds.). *The New Sociolinguistics Reader* [C]. Hampshire: Macmillan, 2009. 212–234.
- [16] Irvine, J. When talk isn't cheap: Language and political economy [J]. *American Ethnologist*, 1989, 16(2): 248–267.
- [17] Jaffe, A. Introduction [A]. In A. Jaffe (ed.). *Stance: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s* [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3–28.
- [18] Johnstone, B., J. Andrus & A. E. Danielson. Mobility, indexicality, and the enregisterment of “Pittsburghese” [J]. *Journal of English Linguistics*, 2006, 34(2): 77–104.
- [19] Johnstone, B. & S. F. Kiesling. Indexicality and experience: Exploring the meanings of /aw/-monophthongization in Pittsburgh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08, 12(1): 5–33.
- [20] Labov, W. The Social Stratification of (r) in New York City Department Store [A]. In N. Coupland & A. Jaworski (eds.). *Sociolinguistics: A Reader and Coursebook* [C]. New York: Macmillan, 1997. 168–178.
- [21] Malinowski, B. The problem of meaning in primitive languages [A]. In C. K. Ogden & I. A. Richards (e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C].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23. 296–336.
- [22] Parmentier, R. *Signs in Society* [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3] Paulston, C. B. & G. R. Tucker (eds.). *Sociolinguistics: The Essential Readings* [C]. Malden: Blackwell, 2003.
- [24] Rampton, B. Foucault, Gumperz, and governmentality: Interaction, power, and subjectiv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 In N. Coupland (ed.). *Sociolinguistics: Theoretical Debates* [C].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303–328.
- [25] Silverstein, M.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inguistic ideology [A]. In P. R. Clyne, W. Hanks & C. L. Hofbauer (eds.). *The Elements: A Parasession on Linguistic Units and Levels* [C]. Orlando: Academic Press, 1979. 193–247.
- [26] Silverstein, M. Indexical order and the dialectics of sociolinguistic life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003, 23(3–4): 193–229.
- [27] Spitzmüller, J., B. Busch & M. Flubacher. Language ideologies and social positioning: The restoration of a “much needed bridg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 2021, (272): 1–12.
- [28] Wardhaugh, R. & J. M. Fuller. *An Introduction to Sociolinguistics (8th Edi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21.
- [29] Woolard, K. A. Language ideology [A]. In J. Stanlaw (ed.).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 London: John Wiley & Sons, Inc., 2021. 1–12.
- [30] Woolard, K. A. & B. B. Schieffelin. Language ideology [J].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1994, 23: 55–82.
- [31] 郭熙. 中国社会语言学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 [32] 田海龙. 中西医结合治疗新冠肺炎的话语研究——基于“双层-五步”框架的中西医话语互动分析 [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2): 128–139.
- [33] 田海龙. 导读 [A]. R. Wardhaugh & J. M. Fuller. 社会语言学引论(第七版) [C].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i–xvi.
- [34] 田海龙. 变异社会语言学的风格研究——兼谈与修辞学风格研究的互鉴 [J]. *当代修辞学*, 2022,

- (4): 11-21.
- [35]田海龙,赵芑. 社会语言学新发展研究[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1.
- [36]徐大明,陶红印,谢天蔚. 当代社会语言学[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37]王春辉. 社会语言学研究 70 年[A]. 刘丹青. 新中国语言文字研究 70 年[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400-429.
- [38]吴春相,王连盛. 近十年社会语言学研究热点述评[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2): 54-60.
- [39]赵芑,田海龙. 语言研究中的意识形态: 概念梳理、角色界定、理论思考[J]. 外国语, 2022 (4): 99-107.
- [40]祝畹瑾. 新编社会语言学概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责任编辑: 葛云锋)

\*\*\*\*\*

## 第二届“文学与教育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文学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

文学与教育的关系是文学与教育两个研究领域均十分关注的话题。从教育成长小说的发生、发展到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与文学的关系,再到文学的教育功能,乃至文学教育学建构的可能性问题的探索,文学与教育的交叉和融合一直以若隐若现的方式贯穿于文学与教育学两个学科领域之中。为推动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探索文学跨学科研究的新路径、新范式、新体系,2022年11月11日至13日,《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与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将联合举办第二届“文学与教育跨学科研究”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文学教育研究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进一步推动文学跨学科研究走向深入,凸显当代学术的中国立场、中国眼光与中国话语。热忱欢迎海内外专家学者拨冗赴会!

**会议主题:** 新文科时代文学与教育学跨学科融通研究

**子议题(包括但不限于):** 1. 文学与教育的关系研究; 2. 文学的教育功能研究; 3. 文学教育视域下的文学翻译与传播; 4. 文学教学研究; 5. 其他相关议题

**会议时间:** 2022年11月12日全天—13日上午

**联系人:** 张老师(行政事务) 电话: 18769723358

翟老师、靳老师(学术事务) 电话: 15650562297 15069121872

**主办单位:** 《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承办单位:**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协办单位:**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